

收获

中篇小说卷（1998—2003）《收获》编辑部 主编

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
龙凤呈祥

池 莉 李 洱 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 龙凤呈祥/池莉等著;《收获》编辑部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收获》60周年纪念文存;珍藏版.中篇小说卷.1998—2003)

ISBN 978-7-02-013008-5

I. ①怀… II. ①池… ②收…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7647 号

总策划 黄育海 程永新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潘丽萍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34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008-5
定 价 9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巴金和靳以先生创办的《收获》杂志诞生于一九五七年七月，那是一个“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特殊时刻，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的出现，俨然于现世纷扰之中带来心灵诉求。创刊号首次发表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好像不只是缅怀与纪念一位文化巨匠，亦将眼前局蹐的语境廓然引入历史行进的大视野。那一期刊发了老舍、冰心、艾芜、柯灵、严文井、康濯等人的作品，仅是老舍的剧本《茶馆》就足以显示办刊人超卓的眼光。随后几年间，《收获》向读者奉献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如《大波》（李劫人）、《上海的早晨》（周而复）、《创业史》（柳青）、《山乡巨变》（周立波）、《蔡文姬》（郭沫若），等等。而今，这份刊物已走过六十个年头，回顾开辟者之筚路蓝缕，不由让人感慨系之。

《收获》的六十年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十年间她曾两度停刊。先是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于一九六〇年五月停刊。一九六四年一月复刊后，又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迫停刊，其时“文革”初兴，整个国家开始陷入内乱。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再度复刊。艰难困顿，玉汝于成，一份文学期刊的命运，亦折射着国家与民族之逆境周折与奋起。

浴火重生的《收获》经历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洗礼，由此进入令人瞩目的黄金时期。以后的三十八年间可谓佳作迭出，硕果累累，呈现老中青几代作家交相辉映的繁盛局面。可惜早已谢世的靳以先生未能亲睹后来的辉煌。复刊后依然长期担任主编的巴金先生，以其光辉人格、非凡的睿智与气度，为这份刊物注入了兼容并包和自由开放的探索精神。巴老对年轻作者尤寄予厚望，他用质朴的语言告诉大家，“《收获》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因而，一代又一代富于才华的年轻作者将《收获》视为自己的家园，或是从这里起步，或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发表在这份刊物，如今其中许多作品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

经典。

作为国内创办时间最久的大型文学期刊,《收获》杂志六十年间引领文坛风流,本身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缩影,亦时时将大众阅读和文学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现在出版这套纪念文存,既是回望《收获》杂志的六十年,更是为了回应各方人士的热忱关注。

这套纪念文存选收《收获》杂志历年发表的优秀作品,遴选范围自一九五七年创刊号至二〇一七年第二期。全书共列二十九卷(册),分别按不同体裁编纂,其中长篇小说十一卷、中篇小说九卷、短篇小说四卷、散文四卷、人生访谈一卷。除长篇各卷之外,其余均以刊出时间分卷或编排目次。由于剧本仅编入老舍《茶馆》一部,姑与同时期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合为一卷。

为尊重历史,尊重作品作为文学史和文学行为之存在,保存作品的原初文本,亦是本书编纂工作的一项意愿。所以,收入本书的作品均按《收获》发表时的原貌出版,除个别文字错讹之外,一概不作增删改易(包括某些词语用字的非标准书写形式亦一仍其旧,例如“拚命”的“拚”字和“惟有”“惟恐”的“惟”字)。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文存的篇目,仅占《收获》杂志历年刊载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对于编纂工作来说,篇目遴选是一个不小的难题,由于作者众多(六十年来各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曾在这份刊物上亮相),而作品之高低优劣更是不易判定,取舍之间往往令人斟酌不定。编纂者只能定出一个粗略的原则:首先是考虑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其次尽可能顾及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兴味,还有就是适当平衡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作品。

毫无疑问,《收获》六十年来刊出的作品绝大多数庶乎优秀之列,本丛书不可能以有限的篇幅涵纳所有的佳作,作为选本只能是尝鼎一脔,难免有遗珠之憾。另外,由于版权或其他一些原因,若干众所周知的名家名作未能编入这套文存,自是令人十分惋惜。

这套纪念文存收入一百八十余位作者不同体裁的作品，详情见于各卷目录。这里，出版方要衷心感谢这些作家、学者或是他们的版权持有人的慷慨授权。书中有少量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暂未能联系到版权（毕竟六十年时间跨度实在不小，加之种种变故，给这方面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考虑到那些作品本身具有不可或缺的代表性，还是冒昧地收入书中。敬请作者或版权持有人见书后即与责任编辑联系，以便及时奉上样书与薄酬，并敬请见谅。

感谢关心和支持这套文存编纂与出版的各方人士。

最后要说一句：感谢读者。无论六十年的《收获》杂志，还是眼前这套文存，归根结底以读者为存在。

《收获》杂志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 目 录 |

尤凤伟	蛇会不会毒死自己	1
池 莉	小姐你早	69
池 莉	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	136
须一瓜	淡绿色的月亮	198
李 洱	龙凤呈祥	238
笛 安	姐姐的丛林	337

蛇会不会毒死自己

尤凤伟

—

我是六〇年春由河北清河劳改农场转到黑龙江兴湖劳改农场的，那时全国范围的大饥饿正在迅速蔓延。犯人在各个劳改单位间转移遣发通称转场。在我总共二十二年的劳改生涯里这种转场经历了不下七八次。按惯例犯人一般不可在同一劳改场所待三年以上，据说这是耽心时间久了犯人和管教干部熟悉了会导致预料不到的情况。就是说犯人不断转场是劳改制度中的一个环节，是安全措施上的防患于未然。尽管这样的动机不会见诸任何文字，更不会对我们犯人（大概也包括管教干部）明说，事实上大家对此皆心照不宣。犯人转场均在严格保密情况下进行，状况可与军事行动等同。在犯人到达目的地之前，任何人都不知将要被转移何处（知道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几百名犯人挤在一列闷罐火车里，罐头

鱼一样与外界完全隔绝。白天黑夜耳朵里都响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无休无止。同一种声音单调地重复，即使是优美音乐，对人的神经都是一种折磨，何况我们每个人正经受着不测命运的折磨。我是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不久又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后送到清河劳改农场改造。从清河到兴湖是我的头一次转场，当时心里很惶恐，也抱有幻想，希望到了新单位生活境况会有所改善。但一到兴湖幻想就破灭了，希望变成了失望。这里的一切就像随同闷罐车从清河原封不动搬过来的：一样肮脏拥挤的监房、一样高强度劳动和一样少得可怜的食物……这种种的不变会使你觉得犯人的待遇是从上帝那里颁下来的，天南海北都得照章行事，不得走样儿。当然大同之下的小异还是感觉得出来的，比如气候，清河的四月已是春暖花开，而兴湖这里冰雪还没完全融化；再比如伙食，同样杂和面儿窝头，清河的发黑（地瓜面为主），兴湖的发红（高粱面为主）；还有管教干部的口音也明显不同，初听东北口音觉得怪怪的，脆中带柔，唱曲儿似的，再严厉的训斥都让我们犯人感到很温和，很有人情味儿。仅凭这一点，我还是觉得兴湖好，别的犯人也觉得兴湖好。如果此时让我们返回关内故里大家肯定是不情愿的。“月是故乡明”对我们犯人可不切实际。

但——我在兴湖农场只劳动了两个月又接到转场的命令。“收拾东西”，管教只说了这四个字。我摸不着头脑，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我立刻反省自己（劳改最大的收获是知道遇事先反省自己），回顾到兴湖后的一言一行，看是否违反过场规，是否冒犯过管教，是否放松了改造。我像晒谷物一样在领袖思想的阳光下一遍一遍翻晒着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两个月的头一个月是兴修水利，具体说是修一条贯穿农场的“反修渠”。我努力劳动，不偷懒服管教，也积极参加学习，不断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虽然有时心里也有牢骚和委屈，可没表现出来（改造的另一个收获是知道将与外界不合的东西包藏住）。后来天暖了，播种时节到了，就搁下水渠开始播种。农场幅员辽阔，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土地，春播工作量很大，农场进入“战斗”状态，管教干部以种种行之有效的办

法激励我们积极表现。“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表现好的摘帽解教（摘掉右派帽子解除教养），表现不好的后果自己知道！”我知道，犯人们都知道。“你们的前途掌握在我们手中，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这是句大实话。管教干部最喜欢同犯人讲大实话，我们犯人也听惯了大实话。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管教都这么把话说得响当当硬邦邦，有的很温和很入耳，有位姓邢的副队长还在队前讲了他家乡的一则农谚，说是“春天累掉裤子，秋天撑破肚子”。这有趣的话把队前的管教都逗笑了，可我们犯人都没笑，因为谁都清楚“累掉裤子”和“撑破肚子”于我们犯人没有因果关系。但那段时间我们可真正是累掉了裤子，天不亮就被哨子吹起，然后列队到营外的大田“战斗”。肩扛“武器”的我们行走在夜色未退的天地间，会让人联想到一队秦兵汉勇的破晓征战。我们同样是征战：战天斗地。拉犁、刨地、耙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谁都不敢停下休息片刻，我们每个人的表现都在管教的监视之下。我们并不怨恨，因为清楚自己是被管制的人，清楚累掉裤子才是好表现。为节省时间，早饭由伙夫（同样是犯人）挑到地头，一人一个形状大小颜色都像猪心的窝头，吃了一直干到天晌。午饭还是一人一颗“猪心”，再就一直干到天黑。这时人人都饥饿疲劳到极点，全身都像散了架，五脏六腑都像被掏空，心情也极坏，谁都不理谁，用凶凶的眼光盯人，连管教这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多事（兴湖曾出现过管教在这时刻训斥犯人被殴打的事件）。回营区的路上不时听到有人摔倒的声音，就像一口袋粮食从驴驮子上重重掉到地上。许多人倒下再也起不来。晚饭还是不差样的“猪心”，各人吞下肚就立刻趴在铺位上睡觉，睡得死猪一般，连鼾声都像猪哼哼，我们犯人都怀疑是顿顿吃“猪心”吃得人也变成了猪。

我回想在兴湖头两个月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自己的“反常”转场寻找缘由，我没有找到。事实上找到了也毫无意义。在管教干部向我宣布“收拾东西”十几分钟后我便走出了营区大门。这时我被告知，这次属本场内部调拨，新地方是农场边缘被犯人称为“御花园”的附属地。

二

“御花园”离农场中心四十多华里，步行大半天路程。这里也被称作“小场”（对兴湖大场而言）。打眼望去，所谓的“御花园”实际上是一大片沼泽地包围着的一块小平地。时下沼泽地一片泛绿，足足的春天景象。粗略估计，沼泽地有几万亩面积，而“御花园”不过十几亩。“御花园”这名字很容易使人想到是一块花卉苗圃地，实际上不是，“御花园”里种植的是庄稼。与整个农场方圆百公里土地相比，区区“御花园”实在算不上什么，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场方却不肯忽略，其一，这里土质肥沃，且被沼泽包围长年湿润，利于作物生长；其二也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一块不在册的土地，确切点说是场部的一块自留地。自留地的作用自然用不着解说，尽人皆知，犯人将它称作“御花园”已道出其中含义，但这多少显得不厚道，在人人饿肚子的大灾年，领导想法子多弄几斤粮食养家糊口也实在是情有可原的。“御花园”通常有三个犯人劳动，以人均耕种土地面积衡量，比大场的犯人要轻松。我被遣发到这里是因为不久前死了一个（后来我知道死者是天津一所大学的一位姓孟的教授。死因不明确，晚上睡下早晨没有醒过来），我顶替了他的空缺。这里的另外两个犯人，一个姓陈，叫陈涛，二十六岁，人大历史系学生；另一个姓龚，叫龚和礼，北大物理系的教授，一头半白头发，使人一下子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后来他说他四十四岁），他俩被劳教的案由同我一样：五七年的老右。

龚教授、陈涛和我可以说是整个兴湖农场数千个劳改犯中最幸运的人。只要对我们的境况稍作介绍你就会相信我说得一点也不过分。我们脱离了农场的管制，来到这块自由的天地，天蓝地阔，空气流畅，没有铁丝网电网的圈围，没有警卫的日夜监视，甚至一个管教干部也没有（场部只不定期来人检查工作），不知根底的人从沼泽地外面向这边望来，会以为这里是一户平常人家。却也不错，是我们三个劳改犯人组合的特殊人家。我们过自己的“日子”，地由我们自己安排耕种，伙食也由我们

自己料理，没有硬性作息时间，想干就干想歇就歇，可以随便说话，大声说话，高兴了也可以唱上几嗓，拉屎尿尿也不用请示报告，够了，这就够了，仅仅这些就足以让大场的犯人羡慕一千年。“御花园”是我们三个人的小天堂。如果不是还穿着劳改服，我们会忘记自己的犯人身份。好好干呵，好好表现。满意中我告诫自己。人交了好运总希望与别人分享，到“御花园”的当天我就给家里写信，我在信纸上不停笔地写：“新地方好，新地方真好，新地方太好了。”我恨不能一口喊出一千个。只可惜这里寄信困难，好消息家里人至少晚知道一个月。

三

陈涛是我们三个人的头儿，这是场方宣布的。只是让他负责，却没明确职务。是“御花园”劳改组组长，还是“御花园”劳改小场场长，还是别的什么什么长？不清楚。我刚来不知该怎样称呼他。不论大小，是领导就不宜直呼其名，笼统地喊他“头儿”难免有嘲讽意味儿，以年龄论，叫他小陈既恰当又亲切，只是亲切有余恭敬不足了。瞧我们犯人遇事就是这么思前想后的没出息。后来我听龚教授叫他老陈，我也就叫他老陈。这么叫心里却不住地嘀咕：我新来乍到姑且不论，龚教授无论年龄和资历都比陈涛高，为何场方不用龚教授而用陈涛？如果陈涛是刑事犯也情有可原（劳改部门如有需犯人担当的差事大多派给刑事犯），而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政治犯。另一种可能是陈涛所犯错误（罪行）比较轻，因此而获得场方信任。后来龚教授告诉我陈涛是从陕北老区考上人大，五七年鸣放他就他家乡对革命作出的贡献说了一通话，末尾加了一句“革命成功后毛主席一次也没回陕北”，这话是事实不假，但难免不叫人觉得话中有话，果然就有人指出这话是影射毛主席共产党忘本。问题一下子就严重了，把他打成了右派。他不服，慷慨激昂地为自己辩护，他说那天他没把话说完，后面要说的是“革命老区人民从心里想念毛主席”。

席”，可这话还没出口就被别人打断了。但没人同意把他没出口的话狗尾续貂接到上面去，何况接上去革命的也抹杀不了反动的。他的话没人听，他继续为自己申辩，后来问题就升了级：将他批捕劳教。他的问题就这样。平心而论，陈涛本质上是个很单纯的青年人（只要看看电影里他的陕北父辈们那一张张憨直的脸，他即使成心复杂恐怕也复杂不到哪里去），他的心术不坏，处事也算公道。以他的负责人身份，他完全可以指手画脚不干活，可他和我们一样干；他掌握伙食，也不以权谋私多吃多占。但他也有不少叫人讨厌的地方，一是吹吹呼呼口出狂言，再就是以领导身份自居动辄教训人。这一点我来到“御花园”的当天就领教过了。他先是向我打探场部情况，问我听没听到政府为右派摘帽解教的消息。我们犯人都关注这个问题，“摘帽解教”这个时代词语就像一轮明晃晃的太阳悬在我们头顶上，给我们热量、光明和希望。犯人在睡梦中笑醒十之八九是因做了被摘帽解教的梦（而不是“做梦娶媳妇”——有些作家在写精神与身体都极其虚弱的劳改犯人的生活与心态时总是将性饥渴写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梦境与现实又是那么遥远，两不相及。我在清河的三年里，只听说有一个作家因表现出色而被批准摘帽和按期解教，而众多的右派犯人却没有他那样的好运。我们的刑期被无限制地延长着，我原本三年的教养期从五七年一直延续到七九年——这自是后话。“御花园”与“世”隔绝，信息不畅，所以我一到陈涛和龚教授便迫不及待向我打听这方面消息。我如实相告：没有什么好消息。以前关于“中央政策放宽”的传言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烟消云散，新的小道消息说，打算给右派摘帽的主意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出的，庐山会议后政治形势突变，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刘少奇主张为右派分子摘帽，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不但被毛主席否定了，还因此受到批评。这是流传在兴湖劳改农场的普遍说法，我将我所知道的情况无保留地说出来，龚教授听了只是摇摇头，没再吭声。而陈涛听后脸唰地变成了死人颜色，两只透出绝望和愤怒的眼珠凶凶地盯着我，就像摘帽解教大权归我掌握偏偏我又不肯高抬贵手那样。我被他盯得不知

所措，我说，老陈……你先闭嘴！陈涛把手一挥，随之将眼光转向在油灯下看书的龚教授，说，老龚你出去一下。出去？龚教授抬眼看着陈涛。出去。陈涛口气很横。老陈，这么晚了叫我出去干啥？龚教授满脸疑惑，不动。我心里也纳闷，不晓得陈涛耍的是啥威风。只听他说，老龚，叫你出去你就出去，我要和老宣谈话。他把“谈话”两字咬得很重，我不由一怔，想起流传在劳改犯人中间的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管教找谈话。管教干部找谈话准没好事。可陈涛是管教干部吗？他有什么资格找我谈话？还霸道地把另一个人赶到黑乎乎的野地里去。我说，这样吧，老陈，咱俩到外面去，老龚用灯光……不行，陈涛斩钉截铁地说，我也要用灯光，做记录。这时老龚没说什么就走出我们住的窝棚。陈涛占领了龚教授原来的位置，并摸出本子和笔摆在面前，板着面孔，一副审人的架势。我心里很反感，也感到屈辱。自从当了劳改犯不仅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个人前途，也失去了做人的起码尊严，在任何人（犯人同类除外）面前都得卑躬屈膝，将自己装扮成摇尾乞怜的狗。而今天这个狗日的同类也狗仗人势耍“官”威。我不言声，等着他信口雌黄。他说，老宣，你也别太紧张，咱这是按常规行事，是场部的指示，我在这里负责，须掌握这里每一个人的思想状况，你刚来，有些情况我得知道，不然领导来一问三不知，也不好交代。不过你放心，我决不会在领导面前说你的坏话。虽然你是河北人我是陕北人，但咱都是犯人，犯人的心是相通的。他这番话说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仍没言声。他这时扭开钢笔帽，笔尖对着纸页，说，我问什么，你要如实回答。姓名？我答宣文祥。他记录了。下面还是一问一答。民族？汉。性别？男。籍贯？山东烟台。出生年月日？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二日。文化程度？大学本科。婚否？结婚又离婚。政治面貌？右派分子、劳动教养分子。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原因？我咬起嘴唇，不知该怎样回答。陈涛见我闭口不言，以一种被冒犯的不满眼光盯着我。但我清楚自己不是回避问题，都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有什么回避的必要呢？我只是觉得一言难尽。被打成右派的人，情况是不尽相同的，有的一句话就能说清根由，有的则复杂，不是一句

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我的情况即属于后种。陈涛等了一会儿，见我仍不开口，就很严肃地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思想改造可不是一句空话，要有实际行动，这就是……我说，老陈，咱都改造好几年了，这个还能不懂？可，我的问题……陈涛问，你是言论问题吗？我摇摇头。陈涛又问，那是什么问题？我明白不说不行的，但又没心情说详细，便简单扼要地向这个“御花园”的犯人头报告起我被戴帽判教的缘由过程。我说那时我在山大教中文，鸣放时我没有言论，也没有行为。到了鸣放后期，学生被发动起来了，对校党委提了许多意见。有的意见还很尖锐。但这时市一层领导已经知道风向有转，市报便将学生的鸣放材料摘要发表并进行了批判，因此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纷纷拥到报社要讨个说法。这就是后来被定为“右派学生闹报社”的著名事件。那天我听说我的学生、女友冯蕾也去了报社，很担心，我不想她被牵扯进去，便立刻赶到报社大门口。那时学生与报社正处于对峙状态，人围得水泄不通。我找不到冯蕾，只得退出，正当这时被赶来监视学生的校团委书记胡滨看见了。他问我是不是和学生一起来的，因当时不愿暴露我和冯蕾的特殊关系，再说我也不想让胡知道冯蕾也参与其中，便支支吾吾没正面回答。这就留下了致命后患，到了反右时我被胡滨检举出来，说我是右派学生的黑后台……我为应付陈涛三言五语讲述了我的那段“历史”，就像画房屋只画出房屋的四梁八柱那样。然而即使这样，我内心也十分痛苦。陈涛听后顿了一下，问我的女友后来怎样，我说她和所有去报社的学生一样被打成了右派。由于她的态度强硬，后来又和我一样被判了劳动教养。陈涛问，她现在在哪里呢？我说关在上海的监狱里。陈涛问，怎么会关在上海的监狱里呢？我说，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老陈你对冯蕾的案子也需要了解吗？听我这么说，陈涛便不再问下去了。最后告诫我今后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帽解教。说到这儿大概他才想起自己的犯人身份，情绪突然低落下来问，老宣，刚才你说的那个情况是真的吗？我问，我说的哪个情况？他说就是毛主席不同意为右派摘帽解教。我想到刚才我说这事时他那副吓人的样子，便故意加重语气说，是真的，而且已被事

实证明了的。果然他的脸又变得像刚才那么难看。我说，没事了，我去把龚教授叫回来吧。狗屁教授！他使劲将手里的记录本合死，眼盯着我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让龚和礼这样的抗拒改造分子搞糟的，本来中央不想把我们关这么久，可有些人就是不识趣，自以为有点鸟毛学问有个教授学者鸟毛头衔就可以不买共产党的账，就可以摆清高拒改造，须知胳膊扭不过大腿的。这不到底是将中央惹翻了吗，真是一泡鼠屎坏了一锅汤呵！陈涛说得痛心疾首。末了转向我，教训道，毛主席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右派中间也有左中右，我们要做右中之左，切不可做右中之右，你可要站对自己的位置呵。

四

无论如何“御花园”都是个自由宽松的天地。陈涛以官自居，可他毕竟不属于品行恶劣刁钻古怪的那类人。他表面咋咋呼呼，实则有口无心。缘于他性情上的疏懒，体现在对“御花园”的管理也较懈怠。由于孟教授的猝死，劳力减少，这里的春播比大场拖后了些。我来赶上个末尾，干了三四天就结束了。之后便是打井。“御花园”本来有一口井，就在我们住的窝棚后面，水量可以满足我们三个人的吃用，但也仅此而已，场部让我们另打一眼是为了用于灌溉。打井是一桩很累的活，幸好这里的土质较松软，劳动也相对轻松，与在大场修水渠和播种相比，我们可以称得上是优哉游哉了（大场的犯人可没有优哉游哉的可能，只要日头不停止转动，他们就不会停止工作）。陈涛教导我右派中间也有左中右，但对于我们三人而言，无论这右中之左、右中之中及右中之右怎样划分，“读书人”角色都是一致的。我们读书的“臭”味相投，劳动之余，我们每人都手捧一本书在读。陈涛读的是社科类，主要是马恩列斯毛著作及古典章回小说；我读的是国内与国外文学方面的书；而物理学教授读的是生物学方面的书，且多是国外原版，如施莱登的《植物学概论》、达尔

文的《物种原始》、海克尔的《生命的奇迹》及中国人朱洗的《生物的进化》等。我和陈涛都觉得奇怪，不知他从哪里弄到的这些书。问他为何对生物学感兴趣，他回答，不是兴趣，是学以致用。这更让人不解。继续追问何意。他沉思良久，方说，物理学是作用于社会发展的科学，以我的年龄和我对国家前景的分析判断，我的专业在有生之年已无用武之地了。而生物学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学科，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中国人面对的最重大课题是怎样活下去，记住吧，小伙子，是怎样活下去……

不久便证实，“怎样活下去”这个怪物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近在咫尺。在四月的最后几天，“御花园”断炊了。我们兴致勃勃的读书活动只能终止，在我们这里，书中没有黄金屋，没有颜如玉，也没有千担粟。

说到断炊必须先交待一下背景材料。古语曰：民以食为天。对于我们犯人，食不仅为天，而且为九重天。事实上每一个犯人从判刑那天起，便面对着怎样活下去的可怕现实，但具体状况还是取决于全国整个经济形势的。比如五七年我刚进清河农场时犯人每月定量最高可达四十五斤，还有可观的蔬菜和副食，虽不能吃个肚儿圆，但也差不多（这样高的定量仍吃不饱主要是劳动强度太高消耗太大），后来来了灾年，定量一次一次往下减，在我转场之前每人每天只有不到半斤粮食。我们常说存在决定意识，这不错，但不全面，存在还决定着人的形态，在大饥饿的煎熬中，犯人的身体迅速向着两极分化，要么奇瘦，瘦得只剩一张皮贴在骨架上，要么奇胖（水肿），那胖法就像劳改农场一天有八顿饭吃。劳改农场成了瘦子和胖子的天下，看不见体态适中的人。（谁还敢说凡有人群的地方便有左中右？）幸运的是瘦子，看上去没活头了却像墙头上的枯草摇摇晃晃总倒不下。胖子就不济，看模样富富态态，可瞒不过阎王爷的眼，死人先死胖子。想想劳改农场大批死人的日子，现在头皮还发麻，那时犯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埋葬饿死的犯人，这是一个犯人能为另一个犯人提供的唯一帮助。兴湖农场情况与清河大致差不多，到了“御花园”，情况也没多少不同，不同的是自己起伙，每月从场部把应得的那份口粮领来，怎么吃自己安排，问题也正出在这里。这又要说到负责人陈涛，